

历届马华公会总会长 与华人文化

President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何国忠
(HOU Kok Chung)

摘要

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 马来西亚的成就让国人引以为豪, 除了 1969 年的五一三族群暴动以外, 人民大体能够平安相处, 从经济成长、政治稳定而言, 在发展中国家里头可算佼佼者。但是作为一个族群, 马来西亚华人却有许多忧患。许多马来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 认为华人是外来者。由于历史发展所出现的复杂因素, 马来人拥有其他族群所没有的特权成了各族群的社会契约。马来西亚的文化发展长期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下, 任何政策的贯彻都被族群问题所主导, 文化问题就在族群问题不能消解下带给华人长期的负担和挑战, 也使华社起了错综复杂的反应。华人领袖知道华人的身份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可以维持的, 但如何维持? 处在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 华人文化的传承在量和质上应如何拿捏? “华文教育”的范畴应该如何界定? 华人领袖对这个问题如何陈述? 回顾历史, 领袖们各种不同的反应和观点, 基本上构成了今日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图景。本文以历届马华公会总会长为研究对象, 探讨大约五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所面对的文化问题。

Abstract

Malaysi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economic progress as a multi-ethnic n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mmunal riots of May 13, 1969, its citizens have generally lived in peace and harmony together.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ts performance has been outstanding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n ethnic community, the Chinese face numerous problems.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Malays often regard the Chinese as foreign arrivals. Arising from complex factor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Malays are able to enjoy special privileges that are denied to other communities. Malays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long been under the shadow of local politics and subjected to ethnic sensi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ractable ethnic considerations, issues of culture have always constituted a responsibility and a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and have often elicited diverse responses from the community. Chinese leaders realize that Chinese identity depends on keeping their culture alive, but how this may be achieved remains a critical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a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country, the manner of moulding Chinese culture i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ense is a matter of debate. Issues of concern also include agreement on the best way to define the scop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approach of political leaders to various issues. History shows that Chinese leaders differ widely in their viewpoints on cultural issues and have basically determined the cultural sce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da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past and present president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the largest political party of the Chinese, in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ir ideas and actions in dealing with cultural issu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一、前言

独立以后，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开始，马来西亚人经历了敦拉萨、敦胡先翁及敦马哈迪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由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掌政。而以华人为主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其总会长也由敦陈祯禄、敦林苍佑、敦陈修信、丹斯里李三春、陈群川、敦林良实相继担任，现在则由拿督斯里黄家定执权。所谓的华人领袖，除了政治工作者，尚有民间大大小小的华团领导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华总、各个州属华人大大会堂会长，但是在维护中华文化上扮演最大角色的，则是以华人教育为奋斗方向的董教总（华校教师会总会 {或称教总} 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或称董总} 合称）的领导人。

“华人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重要的政治课题。马来人对华人文化发展的感受一向强烈，他们觉得自己在独立以前遭受不平等的对待，不只在财富资源上他们没有取得应有的分配，在文化发展上，也长期被殖民地政府欺压，虽然是国内第一大族群，但在独立前夕，他们连一所马来中学也没有，反观身为国内第二族群的华人所办的华文中学，到处林立。

由于历史发展所出现的复杂因素，马来人拥有其他族群所没有的特权，成了各族群的社会契约。在这种彼此分别得清清楚楚的情况下，每个族群的对立面都出现“他者”。马来西亚的文化发展长期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下，任何政策的贯彻都被族群问题所主导。在筹划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讨论中，各个不同族群的主流政党代表基本上都认同，国家建构应以马来文化为中心。当发展马来文教育、马来文化成了这个新国家的重要议程后，一个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其他文化的发展，会不会影响马来文化的前进，会不会破坏国民团结？这是让以后华人领袖烦不胜烦的问题。

华人领袖知道华人的身份是靠文化的传承维持的。回顾历史，我们极想知道是他们如何陈述这个问题，如何界定“华人教育”的范畴，在量和质上如何拿捏文化的传承。领袖们各种不同的反应和观点，基本上构成了今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图景。本文以历届马华公会总会长为主轴，探讨大约五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所面对的文化问题。

二、陈祯禄

马来人在1946年5月12日成立了马来人全国统一机构，国内和国外的发展刺激了成立马来亚华人政党的思考，为了对付共产党，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48年宣布实施紧急法令，由于多数马共党员是华人，许多毫无关连的华人成了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受害者。在剿共声中，英国政府将住在偏僻地区的573,000人迁居到四百八十个集中营，即所谓的“新村”。华人在这次大迁徙中占了86%，被逼远离家园以及牺牲原有的生计，到一个设施简陋及管制严密的“新家园”过着艰苦的生活（Nyce 1973）。许多学校、报刊、社团的行动和操作都受到影响和牵累，陈修信在大约二十年后回忆

这段历史时说这是一个“排华政策”，许多华人都无辜受害，在证据不足下郎当入狱（Tan Siew Sin 1972: 225）。马华公会就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在马来亚的政治舞台。成立的理由清楚不过，华人要有一个合法组织和英国殖民地政府、马来政治领袖交涉。华人要同心合力解决华人在马来亚的问题。1949年2月17日在吉隆坡举行了一个大会。当天，马华公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宣告成立。陈祯禄在这个大会中被选为总会长。

陈祯禄 1883 年出生于马六甲，家境富有，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陈家移居马来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71 年。祖籍福建省漳州的陈祯禄本是一位教师，后来从商，自 1913 年他便大肆参加本地政治活动。他虽然效忠英国殖民地政府，但也关心华人在马来亚的前途，马来亚未独立以前，他最让人民津津乐道的表现是批评文官选拔制度，他不客气地要英国殖民地政府停止肤色歧视的作风，录取本地人。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于 1948 年，两年以后，英国殖民地政府提出以英文为主的教育来建立马来亚国家新观念。这个建议受到马来社会及华人社会的反对。英国政府于是邀请了 5 位洋人和 9 位马来人组成一个委员处理此事。委员会以牛津大学的巴恩氏（L. J. Barnes）为首，所提呈的报告书因此命名为《巴恩氏报告书》（Barnes Report），这份报告书主张国家教育必须通过两种语文，即以英文与马来文的国民学校来培养马来亚国家的观念。

为了表示公平，殖民地政府也委任方氏（William P. Fenn）及吴德耀针对华文教育撰写一份报告书。《方吴报告书》和《巴恩氏报告书》的意见不同，它主张政府也应该发展华文教育，并认为华人其实乐于学习英文及马来文，知道多语所带给他们的益处，但是却反对政府限制他们学习母语的自由。

在语文的问题上，陈祯禄所面对大体就如《巴恩氏报告书》和《方吴报告书》所持的相对立场。一边是强调马来亚观念，主张以英文或马来文来团结人民；另一边则同情华人对华文的执着。

陈祯禄一直都希望可以疏通华人的不安情绪。他希望华人在马来亚“可以共治一炉，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同一政府下，和平生活并

互相合作”（陈祯禄 1949: 3）。这是他的政治理念。他虽然不懂华文，在其他华人来看，还不完全忘本，他的家里据说摆了许多有关中华文化的英文著作，在许多纯受中文教育者来看，他颇了解华人的感受。¹

比起纯受中文教育者来说，陈祯禄在许多事情的思考单纯得多。他没有中国的背景，少了历史的包袱，在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上没有患得患失的苦恼，他从容地投入马来亚社会。这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道道地地的马来亚人，在有关他自己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他有文化传承的困惑。在对待华文教育上，陈祯禄曾发言表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母语”，并保证“马华公会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给予全力支持”（教总 33 年编辑室 1987: 317）。他的名句是：“马华公会一定支持华教，不支持就不是华人”（董总出版组 1987: 578）。

比较一下陈祯禄和当时在华社舆论上最有影响力的教总主席林连玉是有必要的。两人在五十年代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祯禄没有能力以华语和林连玉沟通，他祖籍福建，但福建话也一样不流利，他和林连玉见面的时候得请人担任翻译（林连玉 1990a: 76）。陈祯禄通过英文著作了解中国经典，对中国文化虽然有所体悟，但却不视自己不懂中文为人生憾事。他始终觉得英文给他更多好处，他曾经揶揄为华教事业锲而不舍的林连玉说，孙中山和尼赫鲁之所以厉害，因为“他们学习英文。我自己所以厉害，也是因为我学习英文。可惜你不懂英文，不然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林连玉 1990a: 80）。

陈祯禄是一个充满政治细胞的人物。他虽然也认为华人要求华文教育合情合理，但是他做事瞻前顾后，老练圆滑，对其他族群的反应更是了然于胸。陈祯禄善于交际，和巫统的一些领袖更能促膝谈心，但在同时又晓得如何不辜负华人对他的期待，是华人史上一位少数能在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中左右逢源的人。

1955 年 1 月 12 日，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与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在马六甲陈祯禄家里会谈。东姑正和拿督翁争雄，当时拿督翁的国家党里有许多有权势及担任高级政府公务员的党员，这个新党对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所组成的联盟构成了极大威胁。东姑知道华人不喜

欢煽动族群情绪的拿督翁，但是为了确保华人真正支持联盟，他决定和董教总领袖会面。林连玉这么回忆：

东姑说：“就是由现在起至今年七月选举止，你保证不再提官方语文问题。我不是要求取消你的要求，只是要求你暂时不谈，便利我争取选举罢了。”当时我心里盘算着：反正这个问题不是急切间可以解决的，有时间性的保证无碍于事，不如送个人情给陈祯禄爵士罢（林连玉 1990a: 109-111）。

“人情”二字，显示了陈祯禄的社交手腕在重要的关头发挥了效用。不过，在文化问题上，与其说陈祯禄没有受到董教总领袖的非议，不如说他所受到考验没有像后来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那么尖锐。在陈祯禄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日子中，虽然得周旋在马来精英、英国殖民地官员及董教总领袖之中，但是许多问题的处理却有缓冲的时间和空间。独立以后，局势不可同日而语，一边是逐渐形成的马来文化霸权，另一边则不愿被边缘化的董教总领袖。林连玉在独立以后坚持要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如果当时陈祯禄还在位，他将如何面对永不屈服的林连玉？林连玉后来被取消公民权，如果陈祯禄还在世，在联盟的机制下，他有没有可能替林连玉仗义执言？

这类假设性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陈祯禄在 1955 年摔了一跤后，严重受伤，留医 4 个月，身体日益恶劣，他虽然继续担任马华公会总会长，但是党的实际工作，却交给了李孝式、陈修信、梁宇皋等去处理。以后华文教育的是是非非，他几乎置之度外，他虽然在 1958 年被一些党员游说参加总会长改选，但其儿子陈修信却说老弱年衰的陈祯禄被人利用了（何启良 2001: 109）。

三、林苍佑

林苍佑医生，祖籍福建同安，1919 年 5 月 28 日出生于槟城，早年在槟城大英义学受教育，1937 年获英皇奖学金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1944 年考获医学学位。林苍佑本是槟城激进党人，在 1954 年在陈祯禄力邀

下加入马华公会，但在 1958 年 3 月 23 却以“马华公会需要改组，马华公会需要新血……以挽回颓势”，在总会长选举时将陈祯禄拉下台。在他担任总会长的短时间里，对华人文化发展的支持倒是颇得董教总领袖的心。1958 年 3 月 29 日，在担任总会长不及一周时，南洋大学举行开幕典礼，林苍佑带领王景成及叶若痕赴新加坡为这所新大学打气。

林苍佑和董教总领袖关系良好，他可以诚恳地听他们的意见，1959 年 4 月 26 日，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华校教总及董总召开社团代表大会，参加的代表有一千多人，声势浩大。事前副首相曾经一再阻止林苍佑参加这个大会，但是林苍佑置之不理。

但是担任总会长的林苍佑只是控制党中央，陈修信则控制了马华公会各州的领导层。陈修信及其支持者翁毓麟及陈东海采取了与林苍佑不合作的态度，让林苍佑坐立难安。一方面，林苍佑不能坐视不理董教总领袖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摆脱巫统对马华公会的影响。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和陈修信本来关系就好，东姑摆明对林苍佑不友善，不邀林苍佑派系重量级人物如朱运兴、杨邦孝等入阁。马华公会的内阁代表除了李孝式之外，都是陈修信派系，其中陈东海只是一名马华公会普通党员，却被东姑委为联盟总秘书。而李孝式虽然和陈修信不咬弦，但却也不站在林苍佑背后。在 1959 年 6 月大选前夕，林苍佑向联盟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马华公会要在 104 席的国会里，分得 40 个席位”；第二就是“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总要求，必须列入联盟的竞选纲领。”这两个要求更让东姑大怒，批评林苍佑贪得无厌。东姑在大选前宣布马华公会候选人名字时，林苍佑才知道名单中大部分是陈修信一派的人。更令林苍佑尴尬的是，他身为总会长，不只事先不知道马华公会推派的候选人，就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在名单内。在重重压力之下，他在 1959 年 9 月大选前夕，宣布辞职。针对华人文化发展的困境，林连玉后来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以前我们存有错误的见解，以为马华公会是理想的盟友，理论上也算得执政有分了，我们有四个合理的要求通过马华总可解决的。

可是不幸得很，由于这次联盟内部风潮的暴露，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原来马华的要求竟没有得到盟友的理会，马华公会和会长林苍佑先生不但对于联盟的政纲不能参加一句话，甚至连所谓代表华人的候选人名单，也没有过目的权力……那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谢诗坚 1988: 129-130）。

林连玉的话，事实上已宣布了马来人及华人的地位主次已分。林苍佑于 1960 年 12 月 3 日宣布脱离马华公会。他在 1963 年成立了民主联合党，其政治理念由单一族群路线转向多元族群路线，民主联合党在大选的表现不佳，为了将反对党结合起来，1966 年他以民主联合党的党员为班底，成立了马来西亚民政党，并于 1969 年大选时，在槟城 24 个州议席中，取得了 16 席，成功执政槟州。五一三事件之后，民政党在林苍佑的带领下，加入国阵，和巫统合作（林水椽 2001: 164）。²

民政党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根据地主要是在槟城，虽然强调多元族群的路线，但党员以华人为主，一直都马华公会失意者的另一选择。在华人文化课题的表述，退守槟州以后的林苍佑不只不是先锋，他经常都不发表意见，在敏感课题上，媒体基本上也没有追问他的立场。在林连玉被取消公民权、独大等重大课题上，林苍佑都置之度外。

四、陈修信

林苍佑的位子由来自吉打州的谢敦禄取代，谢敦禄是一名医生，出生于吉打州，原籍福建海澄，也是一位纯受英文教育的人。谢敦禄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少被人提及，主要是大家都知道谢敦禄只是过渡时期的领袖。他担任马华公会代总会长二年多，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时马华公会最有势力的人是陈祯禄的独生儿子陈修信。1961 年 11 月 10 日马华公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谢敦禄自行引退，陈修信被选为总会长。在陈修信的就职演词中，他提到他父亲创党时的理想，以及对联盟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这样的理念一直延续到 13 年后他下台为止。

陈修信 1916 年出生于马六甲，家庭背景使他很容易便投入了马来亚

的政治。陈修信和他的父亲陈祯禄一样，由始至终都要马来亚成为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陈修信受东姑阿都拉曼的影响极大，东姑也一直善待他，在东姑的支持下，陈修信成功地击败林苍佑。从陈修信的角度看来，华巫的合作是可能的，也唯有华巫二族的合作，国家才有前途。

在陈修信的时代，华人社会在文化的诉求上分裂成两种不同形态。一边是以董教总领导人为代表的文化维护者，他们对现行的政策有许多不满。另外一边当然就是马华公会，他们采取协商的方式与巫统处理族群权益，在巫统领袖看来，马华公会的代表当然较为中庸。两者的思想各有依据，对前者而言，保护完整的华文教育合情合理，因为各族人民的语文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看不出为什么华人不能提出这个要求。至于后者，他们是执政党的成员，在他们看来，任何的提案都应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他们认为族群之间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多元族群的社会，任何的方案都决定于“取与让”，陈修信在1971年解释马来西亚这个多元国家的方向时就清楚表明：“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没有一个种族可以永远为所欲为”（陈修信1996:196）。

华社对于1960年《达立报告书》的反应具体地让我们看到两种思维的对立。《达立报告书》将华文中学分为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引起马华公会和董教总领袖分歧的是以下的文字：

- 一、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初中会考和华文中学升学考试，中学所有的公共考试，只能以国语或是作为官方语文的英文为考试媒介语。
- 二、本邦之中学，规定将只有“全部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两种，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所有不合格（不接受改制者）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

执政党的马华公会不断鼓吹华文学校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其主要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目的是在培养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在建设方

面需要的是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等，在行政方面需要的是受过高等教育与通晓官方语文的人员……只晓华语只识华文……在多元族群的马来亚国土里是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³

以陈修信为主的马华公会不断为联盟的教育政策辩护。陈修信在1959年解说不宜退出联盟时补充了一句：“维护华文教育问题不重要”（《中国报》1959年7月13日）。陈修信对考试媒介语的看法最可说明他的心态。陈修信认为以中文为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媒介语是不符实际的。他关心的是华人教育，不是华文教育，华人只要懂得中文就行，不必精深。教育政策要考虑的是学生将来的就业和竞争能力。如果“华文教育永远要用中文回答，不用英文回答，这样下去，华人学生永远分成两派，读华文的和读英文的。这样读华文的，如何和其他的交往？如何培养马来亚共同的思想？”（张木钦1984: 36）。董教总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在他看来无疑是另外建立一个“小中国”。当时他和华社的分别，就如替他写传记的何启良所形容的那样：“在陈修信眼里，华文教育只不过是华人教育的一环”（何启良2001: 131）。

在林苍佑下台事件上，董教总领袖对陈修信的反感已到了极限。原因极为容易理解，林苍佑下台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林苍佑和董教总同声同气，触怒东姑。在董教总领袖看来，如果陈修信能够站在林苍佑后面，支持林苍佑的主张，则林苍佑在华教问题和东姑谈判的筹码，自然增加，也许华教的历史从此改写也说不定。

在比较陈祯禄父子二人时，林连玉认为陈祯禄是民族英雄，而陈修信则是民族“大罪人”（林连玉1990b: 187）。他批评陈修信和他的支持者为“群小当道，假借名誉，胡作妄为”（林连玉1990b: 3, 21）。又说陈修信是东姑的“忠实傀儡”（林连玉1990b: 123）。在林连玉的回忆录中，为了形容陈修信，许多不堪入眼的文字都被用上。他最为生气的是独立不久，陈修信和他的同僚告诉当时的教育部长佐哈里说，华文教育问题不必与董教总交涉，应当由马华公会文化组办理（林连玉1990b: 60）。林连玉批评陈修信“以我们为敌人，甚至要借外力残害自己的同胞，真是丧心病狂”（林连玉1990b: 159）。

花一些笔墨描述一下马来社会的动态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华公会的方针和决定。在 1956 年 5 月 18 日的立法会议里，许多马来议员抨击《拉萨报告书》过于顺从非马来人的意愿。许多议员坚持只有马来语可以当教学媒介语，并且说华人的要求破坏了国民的团结。他们也批评《拉萨报告书》委员会缺乏道德勇气提供一个确定马来文可以成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日子 (Tan Liok Ee 1997: 178)。到了独立以后，东姑所面对的压力并没有缓和。联盟政府迟迟不开办马来文中学引起了马来社会的不快。佐哈里为首的教育部认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因为当时师资缺乏，在全国非马来文学校，小学缺马来文教师 800 名，中学缺 200 名，如果开办马来文中学，则推广马来文的工作将受影响。但是马来社会不接受这个解释。退党风潮在各地蔓延。巫统教师造反，使到东姑不得不在 1959 年暂时离职 (张木钦 1984: 50-53)。

陈修信非常关心马来社会的动态，他因此认为董教总领袖无理取闹，谅解东姑及巫统的处境。以后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僵，林连玉的公民权被取消后，陈修信以为事情可以了结，却没有想到继续林连玉志业的大有人在。他对董教总仍然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立场不能心领神会，特别是沈慕羽的举动，更让他受不了。

1965 年身兼马青副总团长及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代表华社，向首相提呈一个备忘录，就在沈慕羽领导“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之一”的运动不久，马来社会为了确保国语法案获得充分实施，成立一个“国语行动小组”抗衡，更激烈的反应来自巫青团，他们回应说如果华人坚持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他们将要求政府重新检讨非土著公民权的地位。

陈修信本来就不苟同沈慕羽的做法，主要原因是“斯举有违宪法第 152 条，即马来文为国语，也是唯一官方语文。”在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修信逆向华社舆论，在 1966 年开除沈慕羽。沈慕羽被指为是“只知一味努力发扬其个人的英雄主义，在不自觉之间，走上共产党预先安排，预先埋伏的政治斗争的路上去，成为共产党政治斗争的同路人”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 1990: 120)。

文化的政治化终于在六十年代末期演出了流血事件，1967 年政府规定

只有考获政府教育文凭的学生才可以出国留学，这又燃起了维护中华文化人士内心的怒火，他们在这个时候建议创办独立大学，陈修信觉得要求过分，决定和巫统站在一起，并设立拉曼学院抗衡，他讥讽创办独立大学犹如铁树开花（教总 33 年编辑室 1987: 482-493）。陈修信所领导的马华公会虽然声称代表华社，但在文化传承的问题上，华社却以董教总为依归，马华公会领导人的声音反倒成为华社的少数。在 1969 年的大选中，马华公会惨败，联盟所得的议席也大减。反对党在获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后游行庆祝，巫统内部强硬派大为不满，发动在吉隆坡市区举行反示威，就在 5 月 13 日两派人马起冲突，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出名的五一三流血暴动。

陈修信评价马华公会在建国过程里有两项成就：一，是为非马来人争取公民权，二，发展母语教育。很显然的，陈修信也认为自己在争取华人文化的发展，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只不过这种争取华人文化的发展，和董教总的尺寸却有极大的落差。陈修信经常被人批评没有好好替华人争取权益，把华人出卖了。大部分华人在大选时宁愿将选票给反对党也不给马华公会候选人。一位报刊总编辑曾对他作出极为传神的勾勒：“他并不是不知道华人的各种问题，只是不能心领神会，他以为华教在取得某种限度的利益之后，就已经算解决了，预期大家心满意足，击壤而歌，没料到大家会擂起七星鼓”（张木钦 1984: 64）。陈修信虽然关心华人权益，也重视族群和谐，但是对华人来说，那不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重要的是在和马来人谈判的时候，他本人希望赢取多少？华人的各种意愿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五、李三春

李三春祖籍湖北天门，于 1935 年出生在彭亨。小的时候在彭亨北根中华小学念了两年书，转到一所英校，一年后即因举家迁往新山而休学。1948 年在新山英文书院继续中学教育。中五毕业后，到新加坡一所华小教英文，其间由于听到同事讥讽他中文不佳，一气之下决定参加新加坡政府举办的华文高中会考，他一共报考 6 科，除了英文一科外，其余都是华文

科目，包括华文及中国文学。他用了半年时间努力，考获了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中会考文凭。

李三春在 1972 年 4 月 17 日因为许启谟病逝，接任为新的署理总会长，并在 1974 年 4 月 17 日接替以健康为理由辞去党职及政府官职的陈修信的位子。李三春是马华公会第一位能够从容地以中文沟通的总会长。但是董教总却不以为这样的背景能够改善马华公会的形象。首先是在改制中学的课题上，李三春在此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时，以马青总秘书的身份两度出现电台，要华社支持改制中学，当年 27 岁的李三春在 1961 年 7 月 3 日的电台广播时说：“联盟政府，事实上要在目前的情形下，为我们的子弟定下了一条最好的教育政策”（《星洲日报》1961 年 7 月 4 日）。由于许多华文中学的董事都是当地马华公会党要，因此马华公会的鼓吹有相当显著的效果。结果有 16 所坚持独立，55 所接受政府的献议。

以后，李三春的言论一直都与董教总领袖不合拍。例如，1975 年，马华公会呈交《检讨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备忘录》给教育部长时，就被董教总领袖批评为“缺乏神圣的立场”，李三春则反唇相讥董教总领袖不了解实际运作的困境，其中他提出三个重点：第一、要符合家长的需求使孩子能好好掌握华文。第二、学生离校后有合理的地位；第三、学生应接受适当的训练以适应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生活环境。

在意见分歧的时候，林晃昇认为“华人对马华公会领导层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马华公会不愿也不敢代表华人争取合法权益，更扮演加速华小变质的角色。”对许多董教总领袖来说，李三春在华教问题上只是延续陈修信的处理方式。李三春虽然懂得中文，可以直接了解华社舆论，问题是面对巫统政治精英、寻找平衡点时，李三春一直都在顺得哥来失嫂意的处境。在独大事件时，独大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批评他：

弯弯曲曲讲了一大堆，实际上就是说不支援倡议中的独大，也朦查查地不知道在法令中还有那些是可以依据法理去争取的。只是一味地说：这不行那也不行，不要办独大最好，办了独大就会使马华感到尴尬！这还像是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所应持的立

场吗?……假如李三春不是马华总会长,不是整天高喊要“代表华人”,要“表达华人一致的心愿”,要“争取民族权利”,“不必畏惧”……我们也不必费神来驳斥他,只把他当作某些反对或不支援独大的小丑来看待。但是……他这样做……无形中助长了巫族政治集团中某小部分不得人心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语文政策的气焰,并给政府中比较开明、民主与崇尚法治的人士,在考虑批准独大时,带来了不利独大的压力(教总33年编辑室1987:563)。

李三春在任时对文化的发展不是完全交白卷,他所主张的五大计划,被学者形容成具前瞻性的远见,特别是他创立的文化协会,更是让他的支持者津津乐道。文化协会举办不少文化活动,也出版了一些好书和杂志,并且成功地拉拢到著名学者如郑良树教授等参与工作。李三春对他能力所及的华人教育不能说没有建树,他担任总会长时拉曼学院只有学生2千多人,到了1982年,学院的学生人数已超过7000名(黄文斌2001:199-242)。

但是在大课题上,李三春经常招架无力,无法应付华社的要求。李三春担任马华公会总会长的时候,华人的地位由盛转衰的情况极为明显。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让华社处处受到钳制。事实上,七、八十年代华社充满了悲情,新经济政策扶持土著下,“族群利益”的意识无所不在。族群的成员极容易就觉察到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族群的生活形态或文化常被夸大来划分彼此。

六十年代固然有许多文化传承的问题困扰华社,但和七十年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宣言”在1971年出现以后,许多不利华人文化发展的建议都被搬上政治舞台。警察及其他和演艺有关的部门特别挑剔文化表演,特别是掌握文化表演准证大权的警方,更常常刁难申请者(Tan Sooi Beng 1992: 285-286)。许多不合理的条文开始让华社应接不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允许华人在公众场合表演舞狮。七十年代林林总总的文化条文还包括工艺大学要毕业生以马来传统服装及宋谷参加毕业典礼

礼；教育部发出文告要学校的表演活动穿插传统马来舞蹈，传统马来乐器演奏；政府规定许多限制书写中文的条规，包括限制招牌上中文字及学生车上之中文字面积，不准在支票上使用中文（陈祖排 1987；谭亚木、周福泰 1981；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87）。

到了 80 年代初期，情况仍然一样，1980 年教育部宣布全国华小实行 3M 制，并列明在这个制度下华小除了华文及数学外，其他科目都以马来文为媒介语。同一年独大有限公司发动全国一人一元法律基金，起诉政府，经吉隆坡高庭开审。1981 年 10 月，此案审结，亚都卡迪法官宣判独大败诉。1982 年 2 月 15 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联邦法院，但终于在 7 月 6 日的大法官会议中，在 1 票赞成，4 票反对的分歧判决情况下，宣告了上诉失败。从此“独立大学”成为历史名词。

1978 年大选时，接过领导位子 4 年的李三春领导马华公会参加大选，虽然标榜五大计划为华社立下愿景，但是他所领导马华公会的形象比陈修信时代好不了多少，马华公会只能在参选的 28 席中赢得 17 席，李三春心里极为不好受。⁴

1982 年 4 月大选，李三春不堪马华公会代表被讥为都是靠马来选票当选的代议士，往芙蓉国会选区和民主行动党主席直接对垒，结果以 845 张多数票获胜，马华公会的国会议席也增加到 24 席，一洗马华公会多年的怨气。但是扬眉吐气的李三春显然不能在族群问题上取得马来领袖的谅解。5 个月以后，我们听到内政部发函通知由是年十月一日起，除了农历新年外，停止发出准证予所有申请表演舞狮的个人或团体。

李三春在 1983 年 3 月 25 日突然宣布辞去总会长后，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至今无法掌握实情。我们只知道那是马来文化霸权最高涨的时代。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在阴沉沉的五一三暗云下，我们踏入了一个前途茫然的七十年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好转的局面下，被忍受了下来”（郭洙镇 年份不详：3）。说这话的是郭洙镇，这位以董教总领袖身份出现文化及政治舞台的律师对当时华人处境这么感叹：“苦闷！大家都苦闷”（郭洙镇 年份不详：31）。马哈迪在 1982 年宣布大选，郭洙镇与其他董教总领袖如王添庆、许子根、江真诚在

1982年3月31日宣布加入民政党，用的是“打入国阵，纠正国阵”，所谓“三结合”的口号。“三结合”，即是通过执政党（马华公会、民政党）、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以及华团力量的结合。入党声明这样写道：“我们决定参加民政党，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民政党这股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努力谋求综合其他华人政党与社团，把政治力量凝聚起来。促进华族趋向更大的团结。……选择参加民政党采取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以贯彻华教运动的基本纲领”（郭洙镇 年份不详：38）。所谓通过政党，选择的是民政而不是马华公会，无疑掴了马华公会一巴掌。

马华公会无法扮演有效的角色，民间处处寻找出口。1983年全国十三州的华人大会堂、中华公会、中华商会等州级性华人最高领导机构及董、教总所组成的十五华团集体草拟的《国家文化备忘录》及1985年5000多个华团联合签署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更是华人苦闷心情的代表作品，一位报人为这个年代下了一个重要的注解：“八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华人晋入了一个有需探知未来，却又不知如何找寻未来的困境”（谢诗坚1984:444）。

李三春下台以后，梁维泮做了一段短时间的代总会长。1985年11月24日的陈群川在一段冗长的党争后正式取代他担任总会长，但是陈群川任期极短，在1986年9月3日即因官司将棒子交给了林良实。

六、林良实

说到林良实，一定得提马哈迪。林良实如何处理文化，基本上和马哈迪的施政方针有很大的关系。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以后，虽然一再强调无意同化华人，但是让华人觉得文化前景黯淡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1984年吉隆坡教育部命令华小在集会及其他活动上必须用马来文；从1984年开始至1987年争论不休的铲除三宝山事件；作为净土的学术领域也一样沾尘，其中包括1987年马大中文系选修科风波。更令人注目的例子是吉隆坡开埠史的争论。叶亚来一向都被认为是吉隆坡的开辟人，但是文青体育部长阿都沙末却在1980

年撰文否定叶亚来的功绩，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以拉惹阿都拉取代他的地位，1989年直辖区历史协会也公开表明他们不承认叶亚来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他们要争取将“这项事实”纳入小学新课程纲要。

接手担任马华公会总会长的林良实处在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转捩点上。林良实1943年出生于霹雳江沙，是一位纯受英文教育者。他先后就读于太平中学与吉隆坡皇家军事学院，1961年负笈新加坡马来亚大学，1966年考获医学士，赴檳行医，稍后加入马华公会。

林良实初任总会长时面对了许多问题，其中一项是“外来移民事件”，1987年巫统青年团大会上，许多代表纷纷发言指华人为外来移民，并且质疑华人对国家的效忠。马华公会雪兰莪州分会以牙还牙，在大会上通过议案，作出反击。紧张气氛不断升级，最后由副首相嘉化出面谕令各方停止争论，不准互指对方为“外来移民”，此风波才告平息。

1987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中重要的一年。教育部在这一年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华社领袖一致反对这样的作法，10月11日，三个华基政党马华公会、民政党、民主行动党的代表联同十五华团一起在天后宫商讨对策，华文报大幅报导，并对华人空前的团结给予正面的评价。天后宫聚会引起了巫统青年团的反击，在10月17日召开马来人大会还以颜色。族群之间的对峙情况是自五一三以后最紧张的一次。马哈迪采取名为“茅草行动”的大动作，在10月27日运用内部安全法令，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逮捕了高达106名来自不同单位代表、不同族群的所谓“煽动族群情绪者”，《祖国报》、《星报》和《星洲日报》同时被禁（Means 1991: 135; Aliran 1988）。

茅草行动以后，马哈迪渐渐地掌控了巫统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局，族群之间再也没有因为文化问题对峙。董总主席林晃昇与教总主席沈慕羽为了华文教育而坐了近八个月的牢，可说是继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以后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惩罚。

1990年，从巫统分离出去的新政党四六精神党倡组了反对党联盟，给国阵政府自建国以来最为有力的挑战。像1986年一样，华人也助反对党一臂之力，直接受到伤害的是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在1986年的大选赢得

17个国会议席，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但比起1982年的24个议席逊色，特别是以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都被行动党取代。民主行动党在独立以后，一直都是华社不满国阵政府的传声音筒。民主行动党在1982年、1986年及1990年所赢得的议席分别是9、24及20。

但是，由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民党、马来西亚穆斯林印度人国大党、印度人进步阵线、马来西亚团结党等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在1990年大选毕竟动摇不了马哈迪政权。国阵虽然丢失了吉兰丹州政权，总得票率下降为53.4%，国会议席也减少了21席。但是还是在180席中赢得127席，继续保有三分之二的优势，损失未如估计的高。而马哈迪的巫统通过这次大选证明了其地位无可取代，在参与竞选的85个马来半岛的议席中获得70席。四六精神党本来预期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但结果令人失望，只获得8个席位。这次大选是马哈迪治理国家22年中的分界线，马哈迪从此以后专心国家建设。

在众多总会长中，林良实是最幸运的一位。80年代末期国家纷乱，文化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林良实束手无策，在1988年以“渡假”6个星期抗议向马哈迪提出严厉的抗议 (<http://www.mca.org.my/chinese>)。但在接下来的至少10年里，他的日子风平浪静，这是其他马华公会总会长所没有的机遇。

马哈迪在1990年大选以后，在政策上做了许多调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新蓝图固然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但骨干却是全民参与，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一个先进国，到时不再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分，只有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人”。马哈迪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提高马来人的竞争能力，才是确保族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最有效方法，这一点是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前提下陈述的，也就是说，华人和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不应此消彼长，而是“双赢”，彼此合作，制造更大的“经济蛋糕”。

2020年宏愿将国家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从1990年到1997年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开放局面，五一三以后华人被压抑的经商机会突然大增，发展主义的政治基调让我们看到马哈迪大幅度调整民族主义的主张，

1990年以后，他以更宽广的角度看待族群间相处的问题，他似乎更加自觉到他是马来西亚各族的领袖而不只是马来人的领袖，华巫关系进入史无前例的黄金期。

华人对马哈迪的评价，由负转正，产生 180 度的变化。在同声一气“成为先进国”的口号中，文化问题变成是第二线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媒体中已经听不到刺激性的“国家文化”四个字了。马来领袖的举止也出现了变化，他们不断在演词中穿插一些简单的华语。马哈迪发展经济所出现的“去政治化”，成功地消解族群之间的对峙。

马哈迪在九十年代意识到多元文化的事实，他尝试将多元特征化为有力的资源。这种让人焕然一新的文化政策，使到马华公会和董教总领袖的争论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在通过文化节将一部分华人文化推向马来社会时，马华公会与华团领导人也配合的极好，从 1993 年开始的文化节，都广邀他族参加，而他族也配合开放的气候，接受邀请。

商业化的确是一个治理华社文化悲情的良药，1997 年的经济风暴以前，大约整十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率都维持在 8% 之间，像其他族群一样，华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在 1996 年 11 月，共有 69 个华团，在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的领导之下，联署支持一份《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相对于 1983 年草拟的国家文化备忘录，这份纲领用字温和，处处照顾国阵政府的感受，文中特别称赞马哈迪的诚意，把国家带上一条“康庄大道”，使民间团体在文教领域，获得较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罗正文编 2001: 261-322）。华团或政党对文化问题都以协商或低调的方式处理，背后的哲学，就像林良实常说的，不在媒体公开讨论敏感课题，对大家都有好处。

马华公会和华教许多当年的心结，也在 90 年代有了极好的消解，在 1994 年 3 月 15 日，为国内六十间华文独立中学展开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共筹获义款六百万元，并悉数分批交予国内独中，另外，政府不只将高等教育私营化，使到 70 至 80 年代最主要的华人教育问题得以疏解，还批准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及韩江学院的设立，而这些学院，都设有中文系。

林良实公开表明首相马哈迪在国阵或政府的地位就如一个家庭的父

亲。⁵ 马华公会之前的总会长虽然处处受到国阵主席的牵制，但是将国阵主席提高到这样的地位，林良实却是第一人。1999年2月28日，林良实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以英语作一个题为〈马来西亚华人：危机与选择〉的报告后，对记者说：

我经常告诉我党的领袖，如果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必须懂得少数民族的处世之道……别将自己当作是多数族群，那是自找麻烦。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为33.2%，2000年则是26%。华人虽然处处感受的族群人口比例的压力，但是林良实的定位设限，在政治角力上无疑公开确认了华人的从属宿命。有人批评马华公会自林良实始，即处在“逃避政治”的时代，国家的走向充满马哈迪思维的痕迹，马华公会由幕前走向幕后。不满马华公会者这么归纳：“马华现在好像没有给大马华人一个发展的方向，只重视日常的管理”（《亚洲周刊》2000年9月4日）。令不满林良实者纳闷的是：在林良实的时代，华社对马华公会的作法却是谅解多于责备，容忍多于抨击，马华公会在1995年的大选，1999年的大选，表现出奇的好，也没有出现城市选区不支持马华公会候选人的现象。

七、黄家定 / 结语

2003年对马来西亚是极特别的一年，5月23日，林良实和林亚礼双双宣布辞去总会长及署理总会长，中委会当天在会议上一致推选黄家定及陈广才为新任总会长及署理总会长。而首相马哈迪医生也在这一年10月31日退休，交棒给阿都拉巴达威。

巴达威和马哈迪的领导方式虽然有异，但他承接了马哈迪时期大部分的领导班子，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秉承马哈迪要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先进国的理念下，加上巴达威一向宽容亲民的处事态度，巴达威执政时期的马来西亚政府，对于华人文化仍然会持续着开放的态度。而马华公会领袖

的角色一如从前，在关键时可能起作用。沈慕羽这么形容黄家定：

他与陈广才是理想配搭，一定能使马华成为代表华人的政党……，马华由他俩接棒是好现象。以他俩的华文教育背景，对华教，华族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了解及归属感，相信更能接近华社，消除与华社的隔阂（黄家定2005: 134）。

与其说是感言，不如说是对新的领导人有所企盼。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将来的路子走得如何，是好是坏，马华公会领导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黄家定上台以后，即不断和华团领导人对话，并且也为党注入新思潮。为了化解人治所可能带来的权力腐化，他修改马华党章，以身作则，限制由他开始的总会长的最高任期为九年。另外，他也调整官职任期，即马华公会党员在内阁担任部长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或10年，在州政府担任行政议员的任期不得超过3届或15年，推行民主化党风。

黄家定所领导的马华公会还有一段路好走，是非成败以后将有公断。上一代的人决定了这一代人的处境，下一代会出现怎样的图景则决定于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勇气。几十年来，坚持文化传承的华人领袖和马华公会领导人时而合作、时而分裂、时而不谅解、时而有默契。对大部分华人来说，他们不只希望当今及未来的巫统主席是开明的，他们也希望马华公会领袖在族群政治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既有深度又有策略地带领华人走向康庄大道。

注释

- 1 例如郑良树师就称赞陈祯禄为“热爱母语及中华文化”的“学者型政治家”（郑良树 2001: 50）。
- 2 林水椽师在评论林苍佑时，给予林苍佑极高的评价，特别是他在马华公会总会长时，林老师有这样一段评语：“我们今天回头再检视他当马华总会长时所提出的兴革计划，对马华而言，无不可说是积弊的对症下药，而且林苍佑以一个英文教育出身者，那么积极解决华教问题的态度，这种情况连一些受华文教育的后任者也瞠乎其后”（林水椽 2001: 164）。

- 3 这是当时雪州马青团长李孝友和陆庭谕在1960年10月笔战时的文字（教总33年编辑室1987:445）。李孝友于1923年出生于中国，2001年去世。他在1949年加入马华公会，生前在马华公会的最高职位是署理总会长，在内阁的最高职位则是卫生部长，1977年因为和马华公会总会长李三春交恶而被迫辞掉部长职。李孝友去世前三个月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行动，他在2000年11月20日在董教总假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的“从华文中学改制看宏愿学校”汇报会上，向华社公开道歉。他说他在六十年代受到联盟政府及马华公会领导层的误导，鼓吹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津贴，改为国民型中学。李孝友要求华社吸取华文中学改制的教训，坚决反对“宏愿学校计划”（《华教导报》第36期，2000年第6期）。
- 4 五大计划为兴建马华公会新总部大厦、拉曼学院筹款运动、广招党员运动、成立马化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 5 类似这样的表白林良实提过不只一次，其中一个例子见《南洋商报》（2002年4月15日），林良实当时提到马哈迪提出“和平方案”，以化解他和其副手林亚礼之间出现的裂痕。

参考书目

- Aliran 1998. *ISA dan Keselamatan Negara*. Pulau Pinang: Aliran Kesedaran Malaysia.
- 陈修信 1996。〈如被认为是华人团结的障碍，我准备随时引退：敦陈修信演词〉，《石在火不灭：沈慕羽资料汇编（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陈祯禄 1949。《一个国家，一种人民，一个政府》。吉隆坡：马华公会。
- 陈祖排编 1987。《国家文化的理念》。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 董总出版组编 1987。《董总卅年》。吉隆坡：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 郭洙镇 年份不详。〈八十年代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展望〉，郭洙镇等，《华教人士与政党政治》，吉隆坡：铁山泥出版社。
- 何国忠 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的命运》。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何启良 1995。《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2001。〈陈修信：贡献与局限〉，何启良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87。《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 黄家定 2005。《勤政亲民：黄家定语录》。新山：彩虹出版社。
- 黄文斌 2001。〈李三春：时势英雄之得失功过〉，何启良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 教总 33 年编辑室 1987。《教总 33 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林连玉 1990a。《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1990b。《风雨十八年》下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 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 林水椽 2001。〈林苍佑：几度升沉的悲情人物〉，何启良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 罗正文编 2001。《当代大马文存 6》（文化卷，90 年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Means, Gordon P. 1991.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ce, Ray 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沈慕羽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编 1996。《石在火不灭：沈慕羽资料汇编（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谭亚木、周福泰编 1981。《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Tan Liok E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 Siew Sin 1972. *Blueprint for Unity: Selected Speech of Tun Tan Siew Sin*, edited by J. Victor Morais. Kuala Lumpur: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
- Tan Sooi Beng 1992. "Counterpoint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of Malaysia," *Fragmented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Joel S. Kahn & Francis Loh Kok Wah. Sydne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 谢诗坚 1984。《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出版社不详。
- 1988。《林苍佑评传》。檳城：檳榔出版社。
- 张木钦 1984。《民族先锋之歌》。吉隆坡：南洋商报。
- 郑良树 2001。〈陈祯禄：学者型的政治家〉，何启良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